

《学术思想评论》文丛

刘浦江 著

辽金史论

辽宁大学出版社

辽 金 史 论

刘浦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金史论/刘浦江著. -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5

(学术思想评论文丛)

ISBN 7-5610-3755-4

I . 辽… II . 刘… III . 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辽金时代
- 文集 IV . K246.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9889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350 千字 印张: 13.875

印数: 1—1 500 册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雪枫

责任校对: 浦 文

平面设计: 鲁美工作室

25.00 元

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部辽金史论文集。

走上辽金史研究的道路，于我纯属偶然。1988年春，经邓广铭先生的全力举荐，我得以调入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当时担任中心主任的邓先生布置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让我彻底解决《大金国志》一书的真伪问题。我把这部并不算厚的书足足读了半年，逐条查找它的史料来源。这是我接触辽金史的最初契机。此后几年，一度心有旁骛，荒废了许多时日。坐标的最终确定，是1992年8月的事情。那一年我31岁。而今回想起来，总不免有晚学之恨。然而不管怎样，那毕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我越来越确信这一点。

如果从1988年读《大金国志》时起，算是初入辽金史之门的话，到现在正好十年。比起其它断代史来，辽金史的堂奥并不算深，可即便如此，我至今也还只是徜徉在阶陛与门屏之间，远远没有登堂入室的感觉。我这十年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金史方面，目光转向辽史，只是近一两年的事情。从这部论文集里也能看出这种倾向，书中十分之七八的篇什是有关金史的。到我编下一部论文集时，或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关于辽金史的定位，中日两国学者向来有不同的主张。日本东洋史学界因受征服王朝说的影响，传统上以辽金元为一个历史单元，认为它们都属于满蒙史系列；而中国学者则历来都是将辽金史归入中国王朝史系列的，所以习惯上把宋辽金史算作一家。

但这种归属仅仅表现在教材体系和课程设置上，若是说到研究状况，宋史和辽金史俨然是井水不犯河水。尽管有不少宋史研究者声称他们兼治辽金史，可深究起来，他们感兴趣的无非是宋辽、宋金关系而已；而所谓的宋辽关系史，实际上是宋朝对辽关系史，所谓的宋金关系史，实际上是宋朝对金关系史。这与辽金史有甚相干？至于辽金史研究者呢，则颇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雍容。我没有打通宋辽金史的野心，但我很赞赏这样一种观点：研究辽金史，决不能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

毋庸讳言，在宋辽金史这个领域中，辽金史研究者历来是处于下风的。自60年代以来，就有辽金史学家力倡宋辽金时代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之说，这与其说是为辽金史争正统，毋宁说是为辽金史研究者争名分，我把它理解为辽金史研究者对长期以来遭受冷落所流露出来的愤懑和不平。辽金史学要想真正赢得史学界的尊重，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而这将是一个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尽管有人不肯承认这一点），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不过，正是由于辽金史的冷僻，所以尽管史料非常匮乏，但留给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活动空间还卓有余裕。至今做辽金史研究，仍不时有一种垦荒的感觉，在中国传统的断代史学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今天，这是辽金史研究者独一无二的机遇。

垦荒自有垦荒者的艰辛。老实说，做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缺乏同志，缺乏对话者，与唐宋史学界那种风光的场面自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话说回来，史学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虽无“黄金屋”、“颜如玉”，但自有一种旁人难以体味的乐趣，沉潜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够了。

这部书之得以面世，全仗辽宁大学出版社的刘雪枫先生一手促成。辽大出版社在尚未见到书稿的情况下，就将此书列入

出版计划，并慨然允诺动用社里的出版基金来补贴此书的出版费用，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出版这样一部读者面很窄的学术著作，肯定是一桩赔本买卖，显见得无利可图；此书的作者又不是什么名流硕儒，想也无名可沽。在这样一个喧嚣的尘世上，还有什么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更高尚的举动？它向这世界证明了学术的价值与尊严。大义不言谢。只要这本书还有人读，它就将把这种真诚传递给每一个读书人。

自18岁负笈远行，离家已近二十载。这么多年中，我总共只回去过五次。前年夏天，当我回到阔别十一年的家中时，看到母亲的一头银丝，不禁抱愧万分。我生性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当着母亲的面，我什么也没说。深夜沉思，只觉得欠父母的太多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所给予我的爱和理解是无可替代的。我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致以深深的祝福。

在提到我的妻子张文时，我不能不以一种负罪的心情来写下这些文字。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十二年间，她有怨无悔地承担起这个家庭内绝大部分繁杂而琐碎的事务，给我以全力的支撑。令我深为不安的是，这种平庸的生活消磨了她的青春韶华，使她不凡的才具没有机会得到施展。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歉疚，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回报她于万一，不敢企望这本小书能带给她哪怕是一丝半点的安慰。

曾有人建议我请一位前辈名流为这部论文集作序，被我断然拒绝了。我想，既然是学术著作，何须来这种俗套？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即令有名家捧场又能怎样？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判断力彻底沦丧的时代，人们不得不依靠序引、“书评”或者获什么奖之类的名堂去衡量学术水准。这真是学者的最大悲哀。但无论如何，我的著作是决计不要名家作序的。于是我很坦然地写下了这篇自序。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子夜，于京西大有庄

目 录

自序

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	1
金代的一桩文字狱	
——宇文虚中案发覆	23
✓试论辽朝的民族政策	35
✓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	58
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的联姻	
——兼论金代渤海人的政治地位	87
说“汉人”	
——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109
✓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	128
金代户口研究	154
✓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	177
金代户籍制度刍论	195
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	
——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	215
金代“通检推排”探微	242

论金代的物力与物力钱	260
金代杂税论略	279
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304
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	323
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 ——兼评《〈大金国志〉校证》	335
《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	357
✓《三朝北盟会编》研究	373
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	402

附录一 本书征引史料版本备览

附录二 本书作者学术档案

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

天庆四年（1114年），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阿骨打起兵叛辽；次年正月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尽人皆知的史实。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将改写这段历史。

—

《金史·太祖纪》对金朝的开国史做了如下的记载：

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起兵反辽，首战告捷，“撒改使其子宗翰、完颜希尹来贺，且称帝，因劝进。太祖曰：‘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

同年九月，破宁江州。十一月，破辽兵于出河店。“是月，吴乞买、撒改、辞不失率官属诸将劝进，愿以新岁元日恭上尊号。太祖不许。阿离合懑、蒲家奴、宗翰等进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称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曰：‘吾将思之。’”

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元日，阿骨打称帝建国：“收国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收国二年（1116年）十二月，“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及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改明年为天辅元年”。

又据《金史·太宗纪》记载：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太祖崩；九月，太宗即皇帝位，“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

自《金史》问世六百多年来，有关金朝开国史的上述记载从未受到过任何怀疑。但是我近年发现的一些文献及考古材料，却使上述历史记载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吕颐浩写给宋高宗的《上边事善后十策》，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政和年间，内侍童贯奉使大辽，得赵良嗣于泸沟河，听其狂计，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国通好（原注：女真于宣和四年方建国号大金）。”^① 吕颐浩（1071—1139年），北宋元祐间进士，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和绍兴元年（1131年）曾两度出任宰相。据他在这篇奏议中所说，金朝建国之初本称女真国，至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才改国号为大金。然而这一说法的可信程度如何呢？至少有三点理由促使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吕颐浩的上述记载：第一，吕颐浩是南宋位高望重的政治家，而非见识寡陋的俗儒，我们相信他不会信口雌黄；第二，这是写给宋高宗的奏议，而非一般的笔记杂著，不能视为游谈无根的传闻；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吕颐浩的特殊阅历使得他对金初历史拥有无可争辩的发言权。徽宗时，吕颐浩在与辽朝接壤的河北路长期担任转运副使、都转运使，身为北边方面大员；宣和五年（1123年）收复燕京后，又改任燕山府路转运使，对辽金鼎革的历史有最直接的了解，故上面引述的那篇奏议一开首就说：

^①《忠穆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篇奏议在《忠穆集》中没有系年，《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六系于绍兴七年正月，但《会编》所引此疏略去了那句关键的小注。

“臣任河北塞上守臣岁久，目睹金人与契丹相持二十年。”而且，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攻陷燕京时，吕颐浩曾被郭药师劫持降金，在金军中滞留达三四个月之久，《上边事善后十策》也谈到了这件事：“臣于宣和七年十一月陷于虏贼，次年二月得归朝廷。”这些经历可以证明，吕颐浩有关金初历史的记载绝不是来自道听途说，必定是有相当可靠的根据的。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范成大，在他归来后呈交给朝廷的语录《揽辔录》中，提到当时金朝民间通行的一种小本历：“虏本无年号，自阿骨打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小本历通具百二十岁，相属某年生，而四十八年以前，虏无年号，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宁、咸雍、大康、大安各十年，盛（寿）昌六年，乾通（统）十年，大（天）庆四年，收国二年；以接于天辅。”^①从范成大介绍的情况来看，这种小本历在金朝建国之前是采用的辽朝纪年，岳珂针对《揽辔录》的这段记载指出：“按此年号皆辽故名，女真世奉辽正朔，又灭辽而代之，以其纪年为历，固其所也。”^②在辽天庆四年之后接续收国，收国二年之后接续天辅，说明范成大所看到的这种小本历关于金初的纪年与《金史》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揽辔录》的这段文字，引起我注意的是“虏本无年号，自阿骨打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这句话。按照范成大的说法，金朝建立的第一个年号是天辅，没有《金史》所记载的收国年号；而且天辅至今“四十八年”，如此算来，天辅元年当为1122年，与《金史》记载的1117年改元天辅不符。而范成大所称的天辅元年（1122年）正好与吕颐浩所说的宣和四年（1122年）女真国改国号为大金的时间相吻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引范成大《揽辔录》。

^②《愧郯录》卷九“金年号”条。

合，所以我怀疑它们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事实。至于 1122 年以前女真国究竟有没有年号，吕颐浩的奏议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留待下文再讨论。

不仅如此，在金代文献中也同样能够找到很能说明问题的线索。宣宗贞祐二年（1214 年）朝廷臣僚讨论德运问题时，右拾遗田庭芳上奏曰：“又闻故老相传：国初将举义师也，曾遣人诣宋相约伐辽，仍请参定其国之本号，时则宋人自以其为火德，意谓火当克金，遂因循推其国号为金。”^① 根据金人的这种传说，“大金”国号的确定乃是出自宋朝方面的建议，而宋金海上之盟始于 1118 年，至 1120 年才达成联手攻辽的协议。如果上述传说属实的话，那么“大金”国号的建立就不得不早于公元 1118 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发现的金代考古材料也为此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证据。1993 年 9 月在内蒙古敖汉旗清理发掘的一座金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合契丹小字墓志，墓主人是辽末降金的契丹人，在金代曾任博州防御使，卒于金大定十年（1170 年）。^② 这方墓志最令我感兴趣的地方是，志文第 11、12 和 15 行在记载墓主人金初的活动时，三次出现“女真国”的字样（另外第 12 行和 24 行两次称“女真”，无“国”字，可能不是指国号，当是指女真人或女真族），“女真国”被写作“女朮”，而众所周知的金朝国号“大金国”，在契丹小字石刻《郎君行记》中写作“女山朮”。这方墓志对吕颐浩关于金朝原称女真国的说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面对这些发现，我想我们确有必要对金朝开国史重新进行一番审理。

^①《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 年第 9 期。

二

首先需要探寻《金史》有关金朝开国史的史料来源。元代所修《金史》，依据的主要原始材料是金朝实录，《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有一段《金太祖实录》的佚文：“太祖生于辽咸雍四年戊申秋七月。其先为完颜部人，后因以为氏。以辽天庆五年建国，曰：‘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刚，终有销坏，唯金一色最为真宝，自今本国可号大金。’天辅七年八月乙未，终于部堵塗。在位九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条附注中也引有这段文字。^①可以看出，《金史·太祖纪》里的那段记载就脱胎于此，只比《实录》多出“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一句话，当然这句话也不是元代史臣随意加上的。元修《金史》，除了依据金朝实录之外，还参考过金朝国史，苏天爵说：“金亦尝为国史，今史馆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②金朝国史是世宗以后撰修的，世宗大定间确定本朝德运为金德，后来就有人将太祖所建国号“大金”附会为金德之征，故“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之说，大概就是国史中添加的内容。但金初历史的基本面貌在《实录》中已经成形，《太祖实录》二十卷，由尚书左丞相完颜勗领修，

^①《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只有两处引录《金太祖实录》，文字又都不长，而且《会编》的引用书目中又没有列入此书，估计徐梦莘和李心传并没有见到原书，有可能是从归正人的著作中转引来的。但明人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载有“《金实录抄》三本（原注：完颜勗）”，完颜勗领衔纂修的金朝实录有两部，一为《祖宗实录》，一为《太祖实录》。据此推测，大概《金太祖实录》至明代后期犹有残本传世。

^②《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

皇统八年（1148年）成书进呈。^①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目前人们所熟悉的有关金朝开国史的传统说法，大致是皇统八年《太祖实录》成书后定型的。

除了金朝实录和国史之外，另一部金代文献《大金集礼》对太祖阿骨打称帝建国的过程做了如下记载：“收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诸路军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憲、宗幹乃陈耕具九，祝以辟土养民之意；复以良马九队，队九匹，别为色，并介胄、弓矢、矛剑奉上。上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②《大金集礼》是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礼部尚书张𬀩等人编修的一部官书，因此它对金朝开国史的记载当然是与实录、国史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对太祖阿骨打的即位仪式有比较详细的描述；然而我敢断言，即便阿骨打真的是在1115年称帝建国的，当时也绝不会有这么复杂的仪式，这段文字显然有许多藻饰的成份。

与上述金代官方文献相同的记载，我们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几种：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谓铁州人杨朴劝阿骨打称帝，“阿骨打大悦，吴乞买等皆推尊杨朴之言，上阿骨打尊号为皇帝，国号大金，改元收国”。《会编》的这段文字纪年不详，但既然说阿骨打称帝伊始即建国号大金，又有收国年号，可知与金朝的官方记载是一致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详述女真始末，而不注出处，陈乐素先生怀疑它是引自李焘《四系录》的文字，^③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按《玉海》卷五八曰：“淳熙三年，

^①《金史》卷四《熙宗纪》、卷六六《完颜晟传》。

^②《大金集礼》卷一《帝号》（上）“太祖皇帝即位仪”。

^③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2、3分，1935～1936年。

权礼部侍郎李焘进《四系录》，记女真、契丹起灭，自绍圣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会编》卷三备述女真由来，并不始于绍圣，不像是出自《四系录》，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徐梦莘本人根据各种有关记载而对女真历史的一个综述，其中有采自《松漠记闻》、《亡辽录》、《北风扬沙录》等书的内容，而有关阿骨打称帝建国的一节，则可能参考了《金太祖实录》的记载，上文征引的《金太祖实录》佚文，就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

南宋归正人苗耀《神麓记》曰：“太祖，契丹咸雍四年岁在戊申生，自辽国天庆四年甲午岁，年四十七，于宁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称帝号。侍中韩企先训名曰旻。收国三年，天辅六年，共在位九年。”^① 苗耀是金世宗时遁归南宋的，他这里的记载当是依据金朝实录或国史。

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二“历年之谶”条谓：“武元（即太祖阿骨打）以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乙未为收国元年，至哀宗天兴二（当作“三”）年蔡州陷，适两甲子周矣。”又，元好问在天兴三年（1234年）除夕作的一首《甲午除夜》诗云：“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② “甲子两周”，是指金朝从收国元年乙未（1115年）建国至天兴三年甲午（1234年）亡国，正好轮回两个甲子一百二十年。元好问的说法与金朝的官方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年），翰林直学士王磐等奉命编纂《大定治绩》，其序谓“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

^②《遗山集》卷八。

年”。^① 王磐是金末进士，他的这种说法与元好问“甲子两周”的说法是一个意思。《金史》卷二《太祖纪·赞》谓“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是因为金亡于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十日，故将天兴三年略去不计的缘故。一百二十年也罢，百十有九年也罢，都是从1115年起算的。

郑麟趾《高丽史》卷一四睿宗十年（1115年）正月载：“是月，生女真完颜阿骨打称皇帝，更名旻，国号金。”《高丽史》是十五世纪的著作，故有关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的记载大概是以《金史》为依据的。

以上记载都是与金朝的官方说法相吻合的。但是，有关金朝开国史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说法，在辽宋元史料中主要有两种异说，一说谓金朝建国于1117年，一说谓金朝建国于1118年。

金朝建国于1117年的说法以《辽史》为代表。《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在天庆七年（1117年）下记载说：“是岁，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辽史》卷七〇《属国表》也有相同的记载。按照这种说法，金朝没有收国年号，但天辅建元的年份与《金史》相同。又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年（1266年），许衡奏上的《时务五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金完颜氏都上京，迁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② 许衡谓金朝历国一百一十八年，可能也是以为金建国于1117年，与《辽史》的记载暗合。

金朝建国于1118年的说法，以宋元文献为代表。宋人普遍认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是在宋徽宗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重和元

^① 王磐：《〈大定治绩〉序》，《元文类》卷三二。

^② 《元文类》卷一三。

年八月载：“旻（即完颜阿骨打）用辽秘书郎杨璞计，即皇帝位。”他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条中也记载说：“建中靖国元年，辽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骨打叛之，用兵连年，夺辽地大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称帝，以其水生金，故号大金，改元天辅。”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五《金国传》云：“（天庆）四年，遂举兵叛。……辽东人有杨朴者，劝阿骨打称皇帝，以其国产金，号大金国，建元为天辅。是岁政和八年也。”南宋佚名《中兴御侮录》卷上谓阿骨打“自立为大金国大圣皇帝，建元天辅，时本朝政和八年，契丹亦天庆八年也。……阿骨打立六年卒，弟吴乞买立，改天辅六年为天会元年”。此外，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八、李墓《十朝纲要》卷一八、佚名《宋史全文》卷一四等都是这种说法。

再有就是托名宋人而实出元人之手的《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这两部书也一致记载金朝建国于 1118 年。《契丹国志》卷一〇《天祚皇帝》（上）天庆八年（1118 年）条云：“是时有杨朴者，……劝阿骨打称皇帝，改元天辅。以王为姓，以旻为名。以其国产金，号大金。”《契丹国志》卷首所附《契丹国九主年谱》亦以辽天庆八年为金天辅元年。《大金国志》在天辅元年之前不记年号，只称“阿骨打之××年”（《大金国志》谓阿骨打于 1102 年承袭生女真部落酋长之职，其纪年即始于此年），在“阿骨打之十七年（即 1118 年）”下记载说：“是冬，阿骨打用杨朴策，始称皇帝，建元天辅。以王为姓，以旻为名。国号大金。”^① 该书卷首《金国九主年谱》云：“太祖武元皇帝戊戌（宋徽宗重和元年、辽海滨王天庆八年）称帝，国号大金，建元天辅；至癸卯天辅六年（宋徽宗宣和五

^①《大金国志》卷一《太祖武元皇帝》（上）。